

庆祝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 60 周年

学术论文集

(下)

文学 历史 哲学 国际问题与国别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科研处编



A097090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论文集(上、下)/北京外国语大学科研处编.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8

ISBN 7-5600-2443-2

I . 学… II . 北… III . 社会科学 - 文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3362 号

学术论文集 (上、下)

北京外国语大学科研处 编

* * *

责任编辑: 李彩霞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31.5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2443-2/H·1274

定 价: 41.90 元(上、下册)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68917519

目 录

文学

- 文化研究中的《印度之行》..... 张中载(494)
-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与哲学、经典和热点
——世界末俄罗斯学者眼中的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
- 张建华(505)
- 《一封信》——一个唯美主义者的自我反思 韩瑞祥(523)
- 从杰克·伦敦有关中国和华人的短篇小说看作家世界观中的矛盾..... 吴 冰(537)
- 拉丁语系文学比较研究导论..... 沈大力(547)
- 西班牙启蒙运动与新古典主义..... 李德恩(556)
- 埃米内斯库诗歌的文化内涵..... 冯志臣(564)
- 解读《凤尾船——重访威尼斯》..... 盛 力(574)
- 巴尔扎克及其《人间戏剧》在中国
——纪念巴尔扎克诞辰 200 周年及逝世 150 周年的思考..... 张 放(582)
- 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若泽·萨拉马戈与他的长篇小说创作 孙成敖(590)
- 拥抱死亡
——评尤金·奥尼尔的《送冰的人来了》 张 耘(605)
- 生活的真实 艺术的升华
——西奥多·德莱塞和他的小说 郭棲庆(618)

反思人神关系的一部力作

- 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 薛庆国(624)
伊莎贝尔·阿连德与《幽灵之家》 李 放(636)

诗歌格律与主题的历史关系

- 论[俄]加斯帕罗夫诗学研究的独特视角
..... 黄 玮(644)
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审美建构特点 苗 涠(652)
二十世纪罗马尼亚文化的杰出代表埃里亚德 丁 超(667)
超越二元对立:双性同体与《紫色》 石平萍(684)

从神话中原初“双性同体”到小说中的伪“双性同体”

- 评乔治·爱略特的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
..... 龙 艳(702)

发声竟如此艰难

- 对汤亭亭《女勇士》和《中国佬》的文化解读
..... 刘葵兰(711)

被压抑的声音

- 评莎士比亚三部戏剧中的女性人物 胡 俊(722)
走近米兰·昆德拉

- 浅析米兰·昆德拉及其创作 徐伟珠(735)
深刻的揭露 沉重的叹惋

- 评价《福地》 茅银辉(750)
我看《亡军的将领》 陈逢华(761)
莱蒙特《农民》中反映的主题和传统文化 乌 兰(770)
明初才子解缙的文学创作 魏崇新(782)
郑振铎的民间文学研究 黎 敏(793)
从复仇传奇到遗民悲歌

- 谈谢小娥故事的流变 吕小蓬(810)

历史

- 论墨子的“尚贤”与“非攻” 黄 勃(823)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时期的史学研究状况 董希骁(837)
试析十五世纪葡萄牙成为欧洲海外扩张先驱的原因
..... 叶志良(853)
巴尔干民族问题的历史渊源 林温霜(864)
罗明坚——西方汉学的奠基人 张西平(874)
十六、十七世纪葡萄牙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张晓非(903)
坚韧不拔的曲折探索历程
——俄罗斯汉学发展特点初探 柳若梅(920)

哲学

- 老子名说试析 姚小平(932)
意义与真之争 张妮妮(941)

国际问题与国别研究

- 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转型 孙有中(953)
欧盟轮值主席国制的新特点初探 傅 荣(967)
欧洲政治一体化理论与一体化进程中的民族国家主权问题
..... 王展鹏(978)

三

1975年是昆德拉人生的分水岭,这一年他携妻子离开捷克斯洛伐克,移居到了法国,应邀在雷恩大学任教。在布拉格时他研究过法国文学与文化,随着西方生活直接经验的增多,他开始以法国的视角反思捷克的历史文化,以捷克的生活阅历感受西方的现实社会,他逐渐在作品中对东西方生活进行比较与对照,对两种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性的分析。他花了几几年时间完成了他第一本在西方写成的书。

尽管在刚到法国的最初几年里,他一再表示他已把想说的话都说了,他不会再写任何小说了。这部1978年完成,1979年在法国初版的《笑忘录》,预示着昆德拉的创作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书的出版,使昆德拉丧失了捷克国籍,直至1981年,密特朗总统赠予他法国国籍。

除了早期在国内用捷克文初版的《玩笑》和《可笑的爱情》外,昆德拉其余的小说均用捷克文创作,再译成法文由巴黎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独家首版,捷克文本则给捷克流亡作家希克沃莱斯基在多伦多创办的“68出版社”出版。对于实际上已不再拥有捷克公众的昆德拉来说,译文代表着一切,因此在写作时他开始采用非常理性、智慧的表达方式,只是写作时的自由状态、游戏特性、不受时空限制的观念始终无改。他运用准确的语言、鲜明的主题,陈述的事物却是暧昧而不明确的,讽刺的疏离成为他小说的又一个普遍特征。

《笑忘录》的结构比较他以前的作品显得松散。七章结构的小说包罗了内容各异的故事、自传片断、史料、神话、幻想和哲理思考。在小说的文体上打破陈规,呈现无限的自由和开放格局。七章的题目分别为:失去的信件(一、四章)、遗忘、笑声、天使、遗憾和边界。书中有几条故事线索,它们的主角却从未相遇。作者用复调和变奏把小说的每一章联系在了一起,用多重的时空关系,突出

同一事实的不同方面,用最大程度的完整性来综合小说的主题:笑和忘。昆德拉写道:《笑忘录》是一部关于塔米娜的小说,其它故事不过是她的故事的变奏。塔米娜的流亡困境和与遗忘的斗争是带有作者的自传性质的。他认为遗忘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死亡方式,是一种存在,恐怖的不是丧失未来,而是丧失过去,对个人对国家来说都是如此。小说还区别了天使的笑和魔鬼的笑,笑化一切(历史、性、悲剧)为烟云。小说流露了他对祖国的深切怀念和挚爱之情,他用小说探求和验证了他永远失去祖国的可能性。

1978年昆德拉与妻子迁居到巴黎,开始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任教。1982年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问世了。它一出版就受到西方读者与评论界的喜爱,成为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尤其在1988年菲利浦·考夫曼把它拍成电影之后(中文译为《布拉格之恋》),昆德拉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他自己对这部影片并不满意,认为它没有表现出小说的复调结构。昆德拉的小说一共有四部被改编成电影,除了这一部和《玩笑》,还有两部是1969年在捷克拍摄的,取材于《可笑的爱情》——《我,忧伤的国王》和《谁也笑不起来》。昆德拉认为,艺术形式是不容转换的,从1988年至今,他拒绝把他的任何小说拍成电影。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最初题名为《无经验的行星》。无经验是人类境况的一种特质,生命的时间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用前世获得的经验来开始新的生活。小说回到了较为传统的故事叙述,书中描写了两对人物,托马士和特丽莎,萨宾娜与弗朗茨。主角托马士是个捷克神经外科医生,在婚姻和性友谊之间来回游弋,这里触及了灵与肉关系的主题。1968年之后他与摄影师妻子特丽莎一起跑到瑞士,因不满丈夫的拈花惹草,特丽莎回到了捷克,丈夫也跟着返回。为了避开秘密警察的监视,他们搬到乡村居住,谦卑地过着田园生活,几年后死于车祸。

另一条故事线索是捷克移民萨宾娜与瑞士外教弗朗茨,他们因各自不同的出身背景和认知方式,处处导致误解。弗朗茨是天

真神话的牺牲品，在泰国无辜死于一场反对柬埔寨杀戮的示威游行。萨宾娜直接关联着作品中关于“媚俗”的主题。“媚俗”最早是由奥地利作家海尔曼·布洛赫提出的，昆德拉把它从艺术领域拓展到了人类精神状态的范畴。

小说通过复调从各个层面观察事物，验证尼采关于人永恒回归的命题。生活的不可重复使人无法重新选择生活，我们经历着旋转的“轻”，一种责任的匮乏和一种精神价值的失却。这“轻”的思想来之希腊哲学家帕美尼德斯，原指游戏，引申为缺乏严肃，进而指虚无和空虚。书里四个主人公以各自不同的心路历程参与了“存在之轻”的主题四重奏，作者在书中没有给予评判，只是留下了问题，留下了思索。这本在西方人眼里的文学巨著，在 80 年代捷克的自由评论中引起热烈争论，有人认为作者对现实的观点太过黑白分明、让人难以信服。小说在 1985 年获以色列“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作者后来写道：我在 1978 年完成的《笑忘录》是一本表达我对捷克思念之情的书，可是，当我在 1982 年 12 月写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某种东西被彻底地封上了——我再也不会返回当代捷克历史这个主题了。

祖国捷克给予了昆德拉最浓郁的生命底色，波希米亚语言、熟悉的故土环境、幽默的传统积淀和独特的人文风情，在很长时间里对他来说是弥足珍贵、最有价值的东西。后来他把文化的内涵扩大到“中欧人”这个概念里。他在自己的文章和对他的采访中多次指出：中欧，伴随着一串伟人的名字——弗洛依德、爱因斯坦、扬纳切克、布洛赫、卡夫卡、贡布罗维奇和穆塞尔，给予了世界独特的文明贡献。

1990 年间接反映昆德拉中欧经验的小说《不朽》在法国出版。这部小说他只用一年半时间就写成了，译成法文却花了他整整两年的功夫。自从发现《玩笑》的译本几乎被改写之后，昆德拉对自己的翻译工作不得不操起心来。自 1985 年起，他对所有的法译本逐本逐处进行了审阅修改，花费的精力和时间，用他的话说，

足可以写出两本新的小说,但最为重要的是,他从此拥有了体现自己风格的准确译本。他宣布,他作品的译本必须出自捷克文或法文,他拒绝接受译自英文本的转译本。

《不朽》是一本洋溢着法国色彩的欧洲小说,书中没有出现一个捷克人物,都是法国人,它也是一本基于古典主义模型的特殊艺术之作。小说章节更为散漫,把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事件与今日巴黎的普通生活揉合在一起,互相解释,互相对应。它就像一场讨论,书中的人物成为思想的化身,叙述者自由地中断故事,让读者去回顾和反思。叙述和论述的并存,使它更像一部文学随笔选集。昆德拉憎恶现代社会把任何事物都趋向肤浅化、单一化,他在自己的小说里刻意布造复杂的结构,把历史事件镶嵌其中,把主题潜藏在错综的章节里。小说不能让人轻易用三言两语就概括出来,他认为这应当成为当代小说的典型特征。

《不朽》还是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故事。阿涅丝、妹妹劳拉、丈夫保罗之间的生死关系和19世纪歌德的传奇浪漫故事平行展开,复调叙述。作者从法国的具体生活经验出发,认为现代社会给人肤浅、机械、失去人性和疏远的感觉,他对趋于20世纪末的文明进行了批判。书中提出一个问题:当代人能否避开空虚与荒谬的生存危机?小说对“意象学”、“人类情感”等概念进行阐述,同时涉及了成熟的古典主义和现代浪漫主义的矛盾抵触。小说开始于一个魅力四射的女性告别时的挥手动作,它在书中在不同女性身上出现了几次,这是作者的匠心独运,它使这本书成为了一部美丽的小说。

1993年推出的他用法文写的随笔集《背叛的遗嘱》,是继1986年出版的《小说的艺术》之后又一部关于小说的论著,它写得有如小说,九个独立的章节里,文学史上的名人们交错走动。小说的艺术是这本论著的主角,它纵谈小说艺术的同时,又横论了小说与其它艺术的亲缘关系,洋洋洒洒近20万字,给人颇多的感受和裨益。

1995年,昆德拉发表了他第一次直接用法语写成的小说《缓

慢》。小说展示了他所有屡试不爽的特征方式和成熟的写作技巧，它是昆德拉所有作品的幽默附注，也是对《不朽》严肃主题的娱乐缓冲。有趣的是，昆德拉把自己与妻子也作为角色写进了书里。《缓慢》的出发点是关于快乐主义含义的探讨，小说刻画了一群无智无慧的被宠坏了的虚荣之人，作者通过他们对现实的态度和理解，透视了现存的荒谬，洞穿了当今西方文明的人为性和虚无性。他对自我困扰的法国假冒知识分子、政客及其他公众人物进行了嘲讽，揭露了他们的自命不凡和他们行为的肮脏动机。

1997年的《本性》，又译为《身份》、《认》，是他用法语写的又一个短篇，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把它视为《可笑的爱情》主题的深层次发展。只是作者没有让悲剧发生，他把故事演绎为一个梦，善意提醒人们：本性推崇真爱的结合，爱情是纷繁而孤独世界里的自我保护。书中再现了昆德拉现象的主题：爱、死亡、人体的非理想性、在庸俗的芸芸世界里对独处的向往，对商业、广告和喧嚣音乐的厌倦。小说再次旁证了昆德拉超越的睿智，惟有他能把生活中如此隐秘的感觉，把这心曲隐衷转化为一篇小说的素材。

法国评论界对昆德拉直接用法文写的《缓慢》和《本性》比较苛刻，认为它们：“法文生硬、情节无趣、缺少诗意”。2000年昆德拉又出新著，小说《无知》在西班牙首版。这次他放弃了法文，直接译成西班牙语，而且亲自参与第二章的涉及“怀乡”的翻译。对此，西班牙译者贝阿特里齐·德·穆拉解释说：“1985年我们出版他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大约一两年后，他请求我们提供关于西班牙内战时期移民的书籍和资料。无疑，那时关于《无知》的想法已经形成了，这一定是他选择在西班牙出版新作的原因。”

《无知》的主题是去国怀乡。伊莱娜和约瑟夫在时隔20年后回到祖国捷克，在布拉格机场巧遇。他们过去曾有短暂的相处，但未能发展成爱情。在故国，痛苦的现实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被中断的故事无法再续，心中希望的“回归”也未能实现，已经无法跟记

忆中留在布拉格的那部分复合。故事与史诗《奥德塞》的并行关系是很明显的，悲剧气氛笼罩每一页，“无知”或“不解”深入整个篇章。

如果说评论界对他的上两部小说有所保留的话，这次大家都认为昆德拉又找回了过去作品的“明晰之美”，小说的自传成份最引人注目。分离、背井离乡和人物在回忆中重拾自我的主题，使它成为一部很打动人小说。昆德拉的法国出版商伽利玛对他充分肯定：昆德拉的创作是本世纪独一无二的，这像一种新“流浪汉小说”，一边生活，一边又在解释着生活。

四

在 80 年代中期，昆德拉小说悄然在中国兴起，很快形成“昆德拉热”，至今经久不衰，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最近《北京青年周刊》列出了 9 名 20 年来影响中国青年的作家和思想家，昆德拉跻身其中。“中国读者发现：他的作品那么贴近我们的生活经历和记忆，那么吻合我们的阅读期待。”他用如此幽默的语言、笑剧的特质，“把政治和性爱，分别作为公共的和私人的存在境况，被他作为例证织进小说之中。”他如此理性地反醒民族发展道路，深层剖析人类本性。在 1988 年 11 月我国首届“东欧当代文学讨论会”上，昆德拉引起与会者的普遍关注。据不完全统计，昆德拉作品的中文译本发行量超过 50 万册。1992 年 10 月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后，译本的出版转向港台地区。把所有这些加起来计算，百万之巨的发行量，创新时期文学翻译的记录。

昆德拉对现实的姿态是怀疑和批判性的，他反对绝对，强调事物的相对性和多重性。他通过东西欧生活的对比，从哲学高度勘探了当代人的生存主题。他在后期作品里把笔触从捷克推向法国、欧洲甚至整个世界，题材范围也随作品理念化的加重而不断扩大。他点出了当代语言的危机、含义的危机和沟通的危机，他用小说展示了错觉的各个方面，教给读者带着智慧和宽容，把世界作为

一个问题来解决。

他的小说偏离传统的形象小说,成为一种用符号组合的能指小说,文体接近于夹叙夹议的论文。捷克评论家克·赫瓦季克的评价很到位,他这样写道:“突出现代小说符号学的相对性、符号结构的不明确性,使昆德拉得以展示人类生存面向的多种可能性,从而把人从有限的、不可重复的人类生活里解放出来。他通过浓缩小说人物的性经历,分析了这些性遭遇的社会象征意义,从而涉及人这个最基本的主题。”

昆德拉多次明确表示他“仅仅是个小说家”,这是恰如其分的。从《可笑的爱情》到《无知》,他所有的小说都表现出一种体系的创作,一种对“小说的艺术”的体证。他不因理论而枯燥,平淡、轻松的表面蕴涵着深沉、厚重的内在。他开辟了属于他自己的文体,不多的文字,浓缩进众多又巨大的命题:笑与忘、叛与仇、轻与重、性与爱、严肃与嬉戏、短暂与永恒,一任它们在作品里自由流动。他的博大精深,筑成了一座巍然耸立的山峰,使后来者无法企及和逾越。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且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昆德拉著,《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李凤亮、李艳,《对话的灵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
3. Kundera, M. Směšné lásky(可笑的爱情), Brno: Atlantis, 1991.
4. Kundera, M. Žert (玩笑), Brno: Atlantis, 1991.
5. Kundera, M. Nesmrteľnosť (不朽), Brno: Atlantis, 1993.
6. Čulík, J. Milan kundera, University of Glasgow, 1999.

作者单位: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欧语系

深刻的揭露 沉重的叹惋

——评介《福地》

茅银辉

《福地》是莱蒙特的主要作品之一，也是莱蒙特创作思想和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

《福地》创作于波兰被沙俄、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的时期。当时三国对波兰人民在政治上进行残酷压迫，在经济上无情地剥削，在文化上进行旨在消灭波兰本国文化的同化，波兰的资本主义工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当时在波兰的资产阶级存在着多民族和多种族的特征，因而竞争更为复杂、激烈和残酷。在城市中，主要工业部门的手工工场生产逐渐被机械化的工厂生产所代替，工业资本逐渐被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工人在外国资本家的压迫下进行超负荷的劳动；在农村，发生了急剧的土地兼并和阶级分化，大量农民丧失了土地，或沦为地主和新兴农业资本家的雇工，或进入城市，成为工厂的工人。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在波兰发展得异常迅猛，在波兰工业中居首位的是罗兹的纺织业，因而罗兹成为当时各国资本家们趋之若鹜的“福地”，这篇作品也正是因此而得名。作者亲眼目睹了在这块“福地”上资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残暴自私和劳动人民的异常贫困，以其真实、生动的笔触，揭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极端残酷性和无序竞争的混乱性。

小说以罗兹19世纪80和90年代的工业发展为题材，记录了罗兹在短短十几年内由一个小城市飞速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的繁荣大都市的过程。然而，作者以犀利的笔锋，揭开了繁荣背后阴暗的一面。这座繁荣的都市是无比肮脏的，是资本家们互相竞争、尔

虞我诈的战场，是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地狱。在这里金钱可以支配一切，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随意决定人的命运。作者对现代工业抱有敌视的态度，这从那充满全书的对罗兹肮脏和杂乱无章的大量描写中，可以清晰地体会到。清晨，城市被工厂尖厉的催工人上工的汽笛声吵醒，人们呼吸的是一团团从工厂高大的烟囱吐出的黑烟，飘游于泥泞的、几乎是黑色的街道上的风袭击着人行道上一排排躬着身子的椴树，空气中弥漫着由工厂废水、煤屑和燃料混杂在一起的令人窒息的瘴气和恶臭。莱蒙特把工厂林立的城市比喻为张着血盆大口的吃人的庞大“怪物”。作为城市对立面的乡村却被描绘成另一幅景象，月光掩映下的田园风光恬美而充满了神秘：在麦浪起伏的田野上弥漫着透明的薄烟，草甸和沼泽上不时有灰白色的水气升腾缭绕，远远近近响亮的蛙鸣声与秋虫的呢哝相映成趣。从这肮脏混乱的城市与宁静和谐的乡村形成的鲜明对比中，不难体会到作者厌恶甚至仇恨城市资本主义的疯狂发展，崇尚自然，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情绪。这些景物描写，不仅生动形象，而且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为故事的进展营造了很好的氛围，使读者能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正是作家的一大写作特点。作者厌恶工业发展，厌恶城市中大大小小的把人变成机器奴隶的工厂，在作者眼中，大工业城市的发展是破坏纯净安逸的自然生活的根源。因为它使欺骗、虚伪、自私、残酷广为泛滥，他渴望回到骑士文明时代，回归农村自然状态。这种观点不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作者没有意识到正是工业的发展使波兰经济发展的速度接近了西欧和北美的水平，给罗兹和波兰带来了巨大财富，是社会的进步，符合世界发展的方向。但作者对工业发展的负面影响的观察和思考是准确而深刻的，他真实描述了资本是导致社会异化的祸首，以及人们在积累资本的过程中的人性泯灭、心理变态和行为扭曲。

在这肮脏的城市中充满了欺骗、虚伪，资本家们在此进行着残酷无情、不择手段的竞争。作者把注意力首先放在了民族之间和

种族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上,在当时的罗兹,资本大多集中在德国和犹太资本家手中,波兰资本家只占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波兰的民族资本主义刚处于起步阶段,它的发展受到了德国和犹太工业主的百般阻挠,那些人害怕波兰民族工业的发展,他们清楚地知道:倘若波兰人拥有了工厂,并用自己的方式去经营,工厂一定会壮大起来,而一个波兰人成功,就会有更多的波兰资本家诞生,几年后,整个罗兹就属于波兰人了。因此,书中波兰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卡罗尔·博罗维耶茨基在建立自己的工厂的奋斗过程中,遭到了以银行家格罗斯吕克为代表的犹太资本家的联合抵制。由于犹太人从中作梗,答应经营土建项目的承包商退缩了,建厂计划迟迟得不到批准。德国上莱茵公司也拒绝贷款给他们买机器。卡罗尔的朋友和合伙人莫雷茨也由于受到银行家格罗斯吕克的挑拨,在利益的驱使下,背叛了卡罗尔。卡罗尔虽然排除了各种阻力,终于把工厂盖了起来,然而一场大火把卡罗尔的辛劳和理想都付之一炬。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也有着激烈的竞争,印染厂老板布霍尔茨是德国资本家的代表,他拥有亿万家财,被看作是“罗兹的统治者”(莱蒙特,1994,415),棉纺厂老板莎亚是犹太资本家的代表,他也拥有亿万家产,是“犹太人的领袖”(莱蒙特,1994,185),他对他的竞争者布霍尔茨恨之入骨,因为他没有办法战胜对手。他把布霍尔茨挣得的每一个卢布都看成是从自己手中偷走的。他幻想着超过布霍尔茨,超过所有的人,成为罗兹的国王。为此,他常常诅咒布霍尔茨,希望他早些死去。而布霍尔茨也同样厌恶和憎恨莎亚,为了不让莎亚和那些想叫他早死的人快活,他用尽了各种办法治病。

竞争不仅存在于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在同一民族内部也不能避免。人们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不惜采用各种卑鄙的手段:欺骗朋友,利用亲人……在作家看来,现代工业发展带来的是道德的败坏,精神的颓废。在这个世界里,“欺骗、破产、失败、各种阴谋勾当、剥削乃是每日的粮食,大家都贪婪地吃着。他们对于得十分漂

亮的下流勾当表示欣羡，他们在糖果店、酒店和办公室里谈着越来越动听的传闻，对那些公开的欺骗表示赞赏，对千百万计的金钱表示崇拜，不管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不管它和旁人有什么关系，是赚来的还是偷来的，只要是钱就行”（莱蒙特，1994, 143）。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损人利己、为了钱可以不顾一切的人物形象。最具这一特征的典型形象是莫雷茨，他是卡罗尔多年的好友，但在他心里，并不看重任何情谊，在他的血脉中除了生意，一切都不存在。当卡罗尔告诉他美棉要涨价这个极具商业价值的秘密后，他感到非常意外，他不相信有人会把这等好事与他人分享，他甚至怀疑这里有什么埋伏。他并没有为这份友情所感动，而是利用卡罗尔邀他合伙开厂，而又缺乏资金之机，从想搞垮卡罗尔的银行家格罗斯吕克那里贷来大笔款项，扩大自己在工厂中的投资额，企图把卡罗尔挤掉，独霸工厂。而当工厂被大火烧毁后，对“好友”落井下石，撤出全部投资。他甚至把自己的婚姻也当作生意，瞄准了嫁妆不菲的阔老板格林斯潘的女儿梅拉，他明知梅拉并不爱自己，但为了那大笔的陪嫁，他毫不在乎。他向格林斯潘提亲的过程，俨然一幅谈生意的场面，两人为了嫁妆讨价还价，极具讽刺意味。

竞争是残酷的，它摆脱不了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小说中形象地展现了传统手工业在面临机械化大工业生产的挑战中，是那么不堪一击，它如同“一个病人膏肓、将要死去的有机体”（莱蒙特，1994, 241），在竞争中悲惨地死去。衰败的、濒临破产的手工业工场在与那些现代化的、机器在疯狂呼啸着的工厂的对比之下显得那么凄凉，就连“厂房窗外簌簌响着的大树也在对它唱着挽歌”（莱蒙特，1994, 241）。

小说描绘了经济基础的变化带来的人们角色和地位的改变，如农民变成了工人，地主变为了劳动知识分子，雇工变成了百万富翁。这种转变给人们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撞击。作者在小说中形象地展现了人们在面对新的生活环境和新的社会角色时的种种表现。当时的资本家大都是出身低微的社会下层，因其能够及

时跟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不择手段地欺诈、投机取巧，而骤然间暴富起来。这些暴发户，没有文化和道德，赚钱是他们一切行为的目的和准则。例如百万富翁莎亚在十几年前还是一家十分可怜的小商店的掌柜，他为了替主人招揽生意，曾长年累月站在人行道上，经受风吹日晒，总是饿着肚子、破衣烂衫，住在贫民窟里。他使用了许多欺骗手段，例如扣减那些让纺纱工人带回家去进行加工的半成品的重量，做陈货贱卖生意，火烧自己的工厂以骗取保险等，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最终拥有巨额家产。又如楚克尔原本十分贫穷，他从倒卖一些工厂已经毫无用处而别处可用的棉花团、碎纸和棉花屑开始发家，不到十年就变成了一个百万富翁。维尔切克曾常年挨饿，祖祖辈辈都受强者的欺压和凌辱，他因此对金钱和财富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他对富人所拥有的一切，如工厂、房屋、美女、宫殿等就如同“饿狗”看到肉一般贪恋。他做地产投机生意，买卖从被烧毁的工厂废墟中捡来的货物，向穷人放高利贷，做黑市买卖，尽一切可能、不择手段地赚钱，最终爬上了棉纱头巾厂老板的宝座。这些人在发财之后，并不满足，反而变得更加贪婪、吝啬、狡诈和不顾廉耻，他们一心只想拥有更多的财富。他们对穷人没有丝毫的同情心，无情地疯狂地剥削工人，他们把昨日痛苦的经历作为激励自己拼命捞钱的动力。他们对贫穷充满了恐惧，牢牢地抓住自己的钱，盯着别人的钱，觉得别人挣的钱都是从他们那儿偷走的，他们不舍得花一分钱，吝啬得甚至连电灯都不舍得开。

而一些高傲的贵族，面对欺骗成风和残酷竞争的社会现实，却显得无所适从。如特拉文斯基是一位有知识、正直的贵族资本家，他正直、高贵的道德观令他在面临破产的边缘，仍不愿卑躬屈膝去求他所仇恨的德国人援助。他这种固执的态度，根本无法适应毫无道义可言的生意竞技场。因而他感到自己像一堆被汲干了水分的枯树枝，马上就会从罗兹这台大机器中被甩出去。老巴乌姆是一个手工业时代留下来的遗老，他的手工业工场更是无法生存下去。在他身上还保留着波兰贵族的道德观和狭义心肠，尽管自己